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英汉植物词汇词义特征及其文化理据对比研究

陈晦 著

YINGHAN ZHIWU CHUICI TEZHENG JIQI WENHUAJIJU DUIBI YANJIU

本书以英汉语各有的2000多个(条)植物名及植物词语为主要对象,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隐喻理论,并结合植物民间分类、词汇语义学和文化语义学的有关观点,对英汉植物词汇所蕴含的命名机制、认知方式、语义特征及所表现的组合情况、惯用构式、语用特点和词群概貌等,作了较深入系统的对比与分析、描述和阐释,论证比较了英汉植物名隐喻化构建的共性和个性。英汉植物名词义隐喻引申的民族文化理据及英汉植物名语用扩展的类型特征,认为植物词汇的形成与运用是人的认知与民族生态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英汉植物词汇词义特征及其 文化理据对比研究

陈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汉植物词汇词义特征及其文化理据对比研究 / 陈晦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4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7929 - 1

I. ①英… II. ①陈… III. ①植物—英语—词汇—对比研究—
汉语 IV. ①H313②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057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田 文
责任编辑	丁 云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75
插 页	2
字 数	254 千字
定 价	56.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5年度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出版资金资助出版（编号：2015CBZ03）

浙江省社科规划一般课题（课题编号：15CBZZ03）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本研究的背景	(1)
一 植物词汇——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关注点	(1)
二 植物词汇对比研究的基础	(3)
第二节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5)
一 研究的对象及问题	(5)
二 研究采用的方法及语料	(6)
三 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8)
第二章 文献综述	(10)
第一节 认知对比研究综述	(10)
第二节 词汇与植物词汇研究综述	(11)
一 词汇意义研究的三种观点	(11)
二 植物名的理据性和无理据性	(12)
三 植物词汇研究的两个维度	(13)
第三节 英汉植物词汇对比研究综述	(15)
一 英汉语言的共性和个性表现	(15)
二 植物词汇对比研究的不同视角	(16)
三 植物词汇对比研究的理论意义与不足	(18)
第三章 植物词汇的基本概念及认知观照	(20)
第一节 认知、概念与隐喻	(20)
一 概念及隐喻的认知形成	(20)
二 植物概念与植物隐喻的认知形成	(21)
三 他域概念隐喻植物	(22)

四 植物概念隐喻他物	(24)
第二节 隐喻、转喻与植物词汇词义的演进	(26)
一 隐喻、转喻与比喻的关系	(26)
二 中西方“隐喻”研究溯源	(27)
三 中西方“转喻”研究溯源	(30)
四 植物词汇词义演进的隐喻、转喻概貌	(32)
第三节 族群文化与植物词汇词义的演进	(34)
一 词的概念意义和关联意义	(34)
二 植物词汇的文化基因	(35)
三 文化感知对词义扩展的重要作用	(36)
第四章 英汉植物名词义特征对比	(38)
第一节 植物与植物名	(38)
一 物名的“任意性”和“故意性”形成	(38)
二 植物命名的依据和类别	(40)
第二节 英汉植物名类别与分布	(42)
一 英汉植物名的不同分类标准	(43)
二 英汉植物名收录概况	(45)
第三节 英汉植物名的理据	(46)
一 中西方植物名词义溯源	(46)
二 词汇理据的表现类型	(48)
三 英汉植物名理据的差异	(48)
四 英汉植物名理据的变迁	(50)
第四节 英汉植物名理据特征对比	(52)
一 植物名的形态构成简析	(52)
二 植物的民间生物学分类和命名原理	(52)
三 英汉植物名词义形成的差异	(54)
四 英汉复合特称植物名的理据类型及对比	(55)
第五节 英汉植物名词义理据及生态观对比	(63)
一 植物名理据与生态文化的关联	(63)
二 不同理据类型的英汉植物名数量与分布	(64)
三 基于理据类型的英汉民族生态思维异同	(64)

四	植物名词义理据研究对重构生态文化的价值	(67)
第五章	英汉植物隐喻化认知对比	(69)
第一节	植物的概念隐喻	(69)
一	植物隐喻建构的过程	(69)
二	“概念隐喻”与“隐喻概念”	(70)
三	影响植物概念隐喻建构的四种因素	(72)
第二节	英汉植物概念隐喻的共性	(74)
一	类比联系是认知基础	(74)
二	跨域映射是形成方式	(75)
三	实体隐喻是典型表达	(76)
第三节	英汉植物概念隐喻的差异	(79)
一	植物隐喻概念系统的不同之处	(80)
二	源域映射目标域的不同之处	(80)
三	隐喻固定语式表达的不同之处	(83)
第四节	植物词汇词义的范畴化	(88)
一	认知范畴化的含义	(88)
二	植物词汇范畴化的层级划分	(90)
三	原型词义和非原型词义的划分依据	(91)
四	植物词义扩展的认知图式	(94)
第五节	英汉植物词汇转义现象对比	(96)
一	英汉植物名转义的五种情形	(97)
二	英汉植物词转义数量对比	(111)
第六章	概念隐喻下的英汉特称植物名对比	(116)
第一节	“拟人化”植物名对比	(121)
一	“拟人化”隐喻植物名的形成	(122)
二	英汉“拟人化”植物名词义特征的共性	(123)
三	英汉“拟人化”植物名词义特征的个性	(127)
四	“人喻植物”植物名词义理据的哲学思考	(129)
第二节	“拟动物化”植物名对比	(130)
一	英汉“拟动物化”植物名中的动物喻体类型及分布	(132)

二 英汉植物名中的动物隐喻对比分析	(140)
第三节 “拟器物化”植物名对比	(142)
第七章 英汉植物词语结构形式对比	(145)
第一节 植物词汇的结构形式	(145)
第二节 英语植物词的构成类型及特征	(148)
第三节 汉语植物词的构成类型及特征	(151)
第四节 英汉语植物构词异同	(153)
第五节 英汉植物词派生构词力对比	(156)
第八章 英汉植物词汇文化义对比	(158)
第一节 文化义的界定	(158)
第二节 植物民俗文化义与植物词语的文化义	(162)
第三节 英汉民俗中的植物象征对比	(164)
一 婚俗与植物象征	(167)
二 节日活动与植物象征	(171)
三 葬礼与植物象征	(176)
第四节 英汉植物词汇的文化义对比	(179)
第五节 共性和差异分析	(184)
第九章 英汉植物词汇语用义对比	(188)
第一节 植物词汇语用义的界定	(188)
第二节 英汉植物词汇的语用义表现	(191)
第三节 英汉习语谚语中的植物词语对比	(192)
第四节 英汉动物词、颜色词中的植物词语对比	(194)
第五节 英汉人名、地名中的植物词对比	(197)
第六节 含有人体词的植物词语和含有植物词的人体词语	(200)
一 英汉语言中含有人体词的植物词语	(200)
二 英汉“人体词+植物词”惯用词语的对比	(201)
三 英汉“植物词+人体词”惯用词语的对比	(204)
结 语	(207)

参考文献	(210)
------------	-------

后 记	(227)
-----------	-------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本研究的背景

一 植物词汇——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关注点

语言的出现与人类的生活习性密不可分。“生太古之先，觉识于天、地、草、木、虫、鱼、鸟、兽，俾人居巢穴，积鸟兽之肉，聚草木之实”（《古三坟·汉魏丛书》），早期人类是在树上栖居的。语言是为了满足交往需要而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劳动决定了产生语言的需要，同时也决定了创造语言的可能。人类有了语言以后，种群部落不断扩大，生活内容逐渐变得丰富多样。人类在自身所处的客观环境中使用语言，语言与外部世界现实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约定俗成的联系，这种联系便是语言的所指意义（许余龙，2002：38）。最早的语言研究是与哲学、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同步进行的。我国汉朝时出现了训诂学，以学科的形式对古书词义进行专门研究。在印度和希腊，公元前4世纪到前3世纪，就建立了语法学。这些研究体系实际上就是人类对语言的专业性认知活动。

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潘文国，2001）。人类语言最初的词汇是名词，其形成基于对自身和生活处所、生活资料的理解，如人体部位、房屋家具、各种食物的名称等。语言的概念系统是在名词的基础上通过丰富的想象力，运用隐喻等认知方式不断扩展、逐步形成的。譬如用形容词来描述花草、树木特征，用代词来指称家族成员等。传统的词汇研究，无论是针对单个的词还是固定短语，在英语和汉语中都属于词汇学的范畴，是形式语言学的产物。20世纪70年代后，受词汇语义学的影响，有些学者也采用框架语义分析方法，将形式与语义结合起来研究词语，但还是围绕构词和语义“打主意”。80年代以来，词汇研究逐渐走出单一性，呈现出五彩纷呈的形势，如探讨词语的语法化、词语在交际中的语用标记、词语的模糊性，再如依据语言文化学讨论词语的民族文化

性及从语言习得的角度讨论词汇的类别和习得等等。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及 21 世纪后,伴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词汇研究开始转到与人们的认知方式相联系的方向上来。

植物是自然界重要的生命形式,其与人类的生存与延续密切相关。植物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还是人类运用类比描述事物(人)、发展思维的重要取象源。植物词汇是各民族语言词汇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词义的产生、演变反映出人与自然、语言系统与植物系统互动的印迹。作为语言中的基本词汇,植物名不仅是一个民族在语言形式上的个性反映,而且是一个民族感知植物、认识植物、利用植物、栽培植物的历史写照,其词义理据是人类与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反映出不同民族的地域特色、民俗活动、审美情趣和生态文化观念。如在各民族的民俗活动和特别仪式中,植物的树、藤、竹、草、花、果、枝、叶等,都是代表某种重要意义的象征物,与人的心理寄托、精神追求紧密相连。植物词汇不仅用作指称植物实体,而且用来描述非植物类的动物和事物,表达人类的情感和思想。

“词一物”不可分割,植物是人类语言创新和发展的客观源。植物同世界上的其他万物一样,本来也是没有名称的。植物名是人类在生存环境中,本能地运用自身五种官能,即通过视其形、听其声、嗅其气、尝其味、触其表,再经过理解、凝练、总结出来的。各民族先人任意地依据凸显体验的某一特征作为植物命名的理据,当这一特征相近时,理据也是相似的。但由于自然环境、文化心理及认知视角存在差异,同一植物在不同语言的名称也会不一样。正是由于各个国家的植物叫法不一样,不利于人类对全球植物资源的认知、利用、开发、保护,所以,早在 250 年前,瑞典生物学家林奈(Linnaeus)就提出“拉丁双名法”,采用两个拉丁化的名字来命名地球上的植物,以避免一物多名、同物异名或异物同名的混乱现象。1905 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植物学大会通过了“国际植物命名法规”,以林氏的拉丁双名法作为国际植物学界进行交流的标准用名,其他的名称都不算数(崔大方,2006)。从此,各国的植物俗名(或地方名)又多了一个学名(scientific name)。虽然已知的植物有共同的拉丁学名,但对于绝大多数并非从事植物研究的人来说,植物俗名实际上是用来指称植物的唯一选择。因此,每个民族日常语言中都会用到基于植物俗名的植物词语。

英汉语植物词汇在本民族的语言学、词汇学、语义学等基础性研究中一直获得关注和重视,有不少学者在不同时期、以不同视角研究过植物词汇。植物词汇除具有一个指称植物实体的字面意义,还有一个或多个指称人或他物的引申义。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是人类体验活动的结果。词语的引申义建立在概念隐喻基础之上。概念来源于我们日常具体的生产和生活体验,具体概念是身体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直接感知,抽象概念则是通过隐喻构建的。隐喻受生存环境、心理倾向、文化定势、经验多寡、年龄层次及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植物俗名和植物词汇的引申义本质上属于概念性的,是隐喻的结晶。认知语言学对英汉植物词汇的研究从纵向的线和横向的面展开。纵向线的研究包含对植物词汇词义生成、概念映射、词义扩大、词义演变、词形组合、文化理据、语用表现等进行系统归纳分析,横向面的研究包含在纵向的每一个层面上都将英语和汉语进行对比阐释,所以是多面二元的描述。

二 植物词汇对比研究的基础

人类对世间万物的认知往往经历陌生——观察——了解——熟悉这样一个过程。对某种物质或事件熟悉以后,就会在大脑中留下印记,形成感性认识。然后用语言记录下来,并通过语言进行理性和更高层次的认识,从而使文明得以延续,文化得以传承。按照广义进化论的观点,在与人脑认知有关的七个层次中,语言层(语言、符号、技能与行为)只是其中的一个层次,在它之下是意识层(感知、意识、情感、感受),在它之上是文化层(逻辑、科学、宗教、艺术),语言处在意识层和文化层中间(钱冠连,2002:100)。由于人的生物学、社会学特征(如头脑四肢、心理感受、情感体验等)普遍相同,所以对同一物事(entity)的意识层认知也会基本相同。

千百年来,人类之所以能够迁徙融合、交往不绝,也正是因为具有相同生理、心理的意识层。然而,由于每个族群所处地理环境不同、拥有的自然条件迥异、承载的历史变迁不一、应用的科技发明不齐,在语言和文化层面的认知表现也不尽相同,甚至千差万别。认知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Langacker说过:“意象是约定俗成的,因为各种语言的象征性成分并不相同,无法预言……各种语言只不过是用的方式来说话,即使表达的思想是雷同的”(转引自潘文国,1997:36)。比如,同样表达植物自然开

花这一现象,汉语说“花开了”,英语说“The flowers are out”,除了语义,语音、符号、结构都不相同。文化层由于受思维习惯、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教育方式、生态理念的影响,认知上的差异也更大。文化中的许多要素是通过语言来表达、通过语言来演进发展的。

萨丕尔(1964)认为,语言有个底座,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的,也是属于身体上具有某些特征而不同于别的群的一个群;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即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总体。虽然同一种语言内,在地域相距较远的方言之间,说话人用纯粹的语音形式交流也比较吃力(如粤方言分别和其他方言),但很少产生冲突和误解。例如,一个不会讲普通话也不会读写的浙江人到广东生活或一个不会讲普通话不会读写的湖南人到上海生活,就不至于有“culture shock(文化冲突)”的感觉。不是说这个人的适应力多么强,主要是所有的汉族人都处在相同的文化层中。语言的这种“所属性”说明,人的言语表现形式无时不受潜存于语言之外的社会要素的影响和制约。今天看来,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 Saussure 百年之前把复杂的语言现象分为语言(langue)、言语(parole)和言语行为(language)三个层面,该是多么了不起。

无论何种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形式的载体,都有一套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的符号体系。我们进行对比研究,就是从互不相同的语音、语法和词汇层面入手,探究分属两种文化的语言背后的异同点,归纳出认知规律或语言共性,揭示导致语言现象差异的民族性特征。而语言共性研究就是通过比较语言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发现所有人类语言共同的属性(Comrie, 2009: 33)。所以,对比研究本身也算是一种类型学的研究,语言之间的每个层面都可以开展对比,归纳出共性。剑桥大学英语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Gillian Brown (1999: 2) 等学者认为:语言存在着一套可以在不同层次——语音层次、构词层次、组句层次和话语结构层次进行描述的模式,而且“意义”的某些方面可以与每一层次相联系。

从“本体论”(Ontology)来看,词汇应是语言中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因为其他两个要素实质上也是为了表达意义。1905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提出著名的“指称论”,认为词语与其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是意义。语言表达不是空洞的,必须实现传递意义的根本任务。英国语言学家 D. Wilkins (1972: 111) 说“Without grammar very little can be conveyed;

Without vocabulary nothing can be conveyed. (没有语法, 人们可以表达的事物寥寥无几; 而没有词汇, 人们则无法表达任何事物)”。可见, 掌握词汇是承担语言交际的必要基础, 理解词汇是实施语言理解的突破口。

那么, 进行英汉植物词汇比较的基础到底有哪些呢? 除了语言使用者生理、心理上的相同点, 首先还是语言的共性。对于语言共性, 出现于 17 世纪的《普遍唯理语法》一书就有精辟的论述。作者认为, 既然语言是思想的外在表现, 那么语言 and 思想之间必然有着内在的联系。人类语言的共性既表现在人类语言本身的形式和功能上, 也表现在人类共同的认知心理上, 还表现在语言生存的外部环境上 (寇福明, 2007)。不仅仅是英语和汉语, 所有的语言之间都具有语源上的共性, 因为“在我们说任何时期都不存在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的同时, 今天世界上各种语言仍有可能来自同一个祖先; 更有可能的是, 当今各种语言, 最初起源于少数几种语言……人类今天各语言的亲缘关系,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近” (Bolinger, 1993: 485); 其次, 我国和英国生长着近 2000 种相同的植物, 许多植物的英语名和汉语名已经产生了非植物学上的意义, 成为具有想象或联想意义的普通名词进入日常词汇部分; 第三, 英汉语有近两百年相互借用、相互吸收的历史, 不仅目前的英汉语词汇中都留有许多对方语言的痕迹, 而且这种相互吸纳的趋势还在不断发展。

总之, 英汉民族认知自然的共性, 自然语言类型的普遍性,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共性, 是英汉语言具有可比性的前提和基础; 英汉语言宏观微观上的不同, 东西方文化和哲学的差异性, 是英汉对比的初衷和归宿。英汉植物词汇对比研究的基础概括起来就是: (1) 语源共性; (2) 语言内部 (认知、功能) 的共性; (3) 语言外部 (生理、社会、自然环境等客观存在及人的认知规律) 的共性; (4) 语言演变的共性。

第二节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 研究的对象及问题

本研究主要依据认知语言学、词汇语义学、文化语义学和植物民间分类原则等理论, 从概念隐喻、“范畴化”、“原型”和“互动体验”、“百科知识”角度入手, 基于植物俗名的词义理据和文化引申的考究, 通过对英汉植物词汇命名机制、认知途径、语义特征、组合情况、惯用构式、

语用特点、意义对应和词群概貌等方面的系统对比研究,探讨植物名隐喻化的概念建构和英汉植物词汇的认知语用特征,对比阐释英汉植物词汇的基本义、隐喻义和语用义的异同,论证、归纳和补充描述植物词汇所反映出的英汉民族认识自然、理解世界的文化共性与差异。

本研究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英汉语植物词汇研究现状;植物名与理据;植物名的“有理”和“无理”表现;英汉植物名理据对比;认知、隐喻等基本概念及植物词汇词义的认知观照;英汉植物名词义理据及其生态观;英汉植物词汇结构形式;英汉植物词汇词义扩展与引申(民俗义、文化义、语用义表现);英汉植物名中的人体隐喻及其文化理据;英汉植物名中的动物隐喻及其文化理据;特别语言现象——英汉植物词语惯用搭配,等等。

研究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从植物俗名出发,依据个体植物的立体生命形式所对应的“苗”、“草”、“树”、“竹”和其构成部分的“根”、“茎”、“节”、“枝”、“刺”、“叶”、“苞/芽”、“花”、“果”、“种(子)”、“核(仁)”等中心概念词为范畴划分层次结构,分析对比由这些中心词组成的英汉植物词语的语义、语用特点(包括词义的词源概貌、结构形态特征、转义特征等),提出“自然名物——类比映射——添加合成——民俗派生”的英汉植物词语的立体认知路径,并在此基础上,以框架图形式对应描述英汉基本植物词词群的语言表现和文化印迹,为进一步构建英汉植物词汇语料库提供语义语用描述的基础。二是以概念隐喻理论为视阈,将植物命名与民族文化联结起来,对英汉复合植物名中所体现的“植物是人”、“植物是动物”、“植物是器物”等概念隐喻进行定量统计,并揭示英汉民族对植物“拟人化”、“拟动物化”、“拟器物化”命名的认知现象及背后折射出的英汉民族社会文化心理的异同。

二 研究采用的方法及语料

鉴于植物词汇词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既有客观词义,又有主观词义和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恐怕某个单一的理论不足以阐释其语义表现,故本研究试图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认知语义学、概念隐喻、文化语义学以及语用学理论,构建一个综合的理论分析模式,综合运用文献调查、概念梳理、语料库数据、历史研究、语言翻译、对比论证等研究方法,侧重英汉植物词义及其文化理据的微观探究,从多方面、多维度对植

物词语的语义、文化和语用进行系统的描述与剖析。

语言研究离不开描写和解释。离开详尽的描写,解释就失去了说服力;没有可信的解释,描写也就失去了作用。描写是基础,解释是归宿。本书研究的思路是依据相关理论、运用对比方法,首先对英汉植物名的名、形、义和语法结构等语言现象进行宏观分类和描写,在此基础上对英汉植物词汇进行微观层面的对比,同时对英汉植物词语义形成和理解的文化理据进行解释及系统总结。对比描写主要是共时性的,但由于在追踪具体词义时要结合词语的语源,所以也不排除使用到一些历时性的比较。虽然本研究主要的方法是分类和对比、分析和描写,但在对植物名理据进行归纳、对英汉植物词引申义进行综合比较时,也采用归纳和演绎法及统计分析法。

本书的考察对象是英汉植物名和用于人名、地名、物名、习语、谚语、惯用短语、经典句子及著名诗歌中的植物词。由于植物名数量较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其中有些还比较生僻,所以本书将所考察的植物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特称植物名,诸如“arrowgrass (三芒草)”、“camel thorn (骆驼刺)”、“goatweed (羊角芹)”、“蜈蚣草”、“马鞭花”、“银条菜”等;另一部分为泛称植物名,诸如“树、竹、花、草、叶、枝、根、刺”等。特称植物名语料主要来源于下面的典籍:汉语《植物名实图考校释》[(清)吴其濬原著、张瑞贤等校释,2008]、英语 *The Timber Press Dictionary of Plant Names* (Coombes, 2009)、汉英拉语《汉英拉动植物名称》(胡世平,2003)。泛称植物名语料主要来源于《新英汉词典》(2005)、《英语大词典》(陆谷孙,2007)、《现代汉语词典》(2002)、英语国家语料库(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和 Chinese Giga Word 2 Corpus: Mainland (现代汉语语料库)等英汉语权威词典及语言类语料库。

此外,为了更为详尽地考察英汉语言中的植物词汇,本书的研究除了利用语料库来分析英汉基本植物词语的搭配、词义扩展和转义现象,还选用一些英语俚语和汉语方言中的口头常用语、歇后语作为例证语料,这部分例子只用来证明植物词语在语言形态、文化语义和句法特点方面的共性与个性,不代表它们应用的广泛性和题材涵盖面。还有一些用于例证的植物词语选自报刊、网络、街头标语。为节省篇幅,书中例词不再一一标明出处。

[注:我国清代大型植物学典籍《植物名实图考》,“在世界植物学界

颇具影响,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张瑞贤等,2008:648)。而《植物名实图考校释》是对其进行校记和注释的专著(词典),主要用简体字呈现各种植物的“名”、“实”及生物学特征,校释了《植物名实图考》中刊载的全部1714个中的1708个植物名,能够为本书提供丰富的汉语植物名例证。英语词典 *The Timber Press Dictionary of Plant Names* 收录英语国家(主要是英国和美国)植物名2079个,其目的主要是帮助园艺学家、植物学家及植物爱好者了解植物的所属种类、生长习性、颜色、外形和药用特征等。该词典还标出英语植物名所对应的拉丁名、法语名和德语名,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英语植物名的词义概念及与另外三种语言的植物名之间的形义联系,为本书考察现代英语语言中的复合植物名提供基础。

三 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植物名不仅有助于我们区别植物特征、称谓成千上万的植物(就像人名区别人一样),而且经过长期锤炼、代代相传,已经成为日常交际中有助于信息编码和解码的富有民族文化意义的“能指”(signifier)词。英语和汉语都有丰富的植物词语。这些词语洗练、形象地反映了英汉民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风俗习惯、生活哲理,是进行语言文化研究、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要语料资源。

因此,建立在英汉植物词汇命名理据、隐喻认知、词源语义、构词特征、词义扩展、文化理据、民俗知识、语用表现等方面对比之上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其成果不仅有助于了解英汉民族的认知特征,有助于从不同文化角度认识植物词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而且在英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语言研究与翻译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研究成果可以有效地运用于英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这是因为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只有同文化含义紧密结合,才能有效地促进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植物词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特色、折射出典型的意识思维,不仅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劳动中广泛使用,而且还应用于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中。

第二,研究成果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英汉语言中植物词语的国俗义、文化义,从而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含有植物词语的各种固定表达,有利于跨文化交际。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与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英汉植物词语经历千百年锤炼出来的国俗义、文化义,能够鲜明形象地反映